

# 建党精神的文学轨迹及现实启示

王慧慧 张堂会

**摘要：**1917—192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革命形势最为复杂多变的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力的进步文士记述了中共发展史上深具开创意义的重要事件，呈现出对动荡现实和社会趋势的深入理解，中共酝酿、创建、成长的壮阔历史和精神要旨便于文学阐发中崭露头角。依凭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初的发展轨迹探源中国共产党发轫时期的精神品格，不仅是进入文学空间的独特视角，更是对于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综合研究的重新认知，足以凸显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征途、在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基准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轫时期；建党精神；文学轨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4—0176—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sup>①</sup>的建党精神，将中国共产党艰辛求索的精神源流融汇为丰硕充实的境界！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面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sup>②</sup>号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愈加强调这一精神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确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sup>③</sup>为清晰明了的开篇主题，持续“号召全党学习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sup>④</sup>。由此可见，建党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彰显出民族复兴的潜在力量。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深入探究中，可以发现，1917—1927年不单是中共党史研究特别看重的发轫时期，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衍变的首个可贵十年。对于这个过渡时期的研究判断，学术界一般注重剖释新旧思潮的相互碰撞或者宏观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举措对于推进革命前行的显要意义。事实上，依循主流意识形态来探寻时代的脉络以及文学的踪迹，还有很大的价值空间可以推进。而沉潜于过往文本的衍变细节，理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思想红线，可以发现一个无法绕开的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根基，肇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革命场域，深化为中国共产党延续性的文化基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呈现、品质构成，与此同时，文学话语的社会效应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走势起到助燃作用。故而，“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sup>⑤</sup>。

**作者简介：**王慧慧，女，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堂会，男，扬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②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③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

④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页。

⑤ 陈思和：《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的本色和亮色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注解和旁证，尤为突出的是形成跨越时空的潜隐力量，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文学理路的演进，创作者们通过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本源，努力提振文思文脉，为文学艺术的推陈出新撑起坚韧的内核，从而在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复杂的历史变局面前，打开文学事业守正创新的天地。由上所述，本文将1917—1927年的人文脉络，置入更为充沛的精神领地，从而发掘思想资源与文学领域的互动合流，不仅提供了观察历史变动的不同视野，也构成更深一层领会现当代文学内在特征与本质的别样方式。

## 一、文学新态势蕴蓄中共诞生的气息

20世纪初，中国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深重的封建压迫、混乱的军阀内战和外部的长期欺凌使得文人志士陷入精神危机，直至新式知识分子与西方文明接触，晦暗不明的救亡之路从此引入进步潮流。回顾往昔，蔡元培一语道出文学的地位：“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sup>①</sup>思想的急遽变动开启文学创作的新生，“五四”前后出现的新文学之“新”就在于其以责无旁贷的内驱力量深入到社会人生。在对各色民主、自由学说的广泛探索中，十月革命的时代先声使许多文化巨人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能动的冲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知识精英甫一碰撞便爆出的火花。由此观之，新文学的“新”还在于精神的新变带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性转向。

### （一）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倾向的激变

文学与政治始终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恩格斯的观点是：“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sup>②</sup>显然，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文学运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将改变处境的意识转化到对于国族危机的应对。这一点陈独秀表现得尤为迅疾，他于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便是向旧文化旧文学发起抨击的战斗号角，实际是期望通过汲取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重新确立文学的平民化、现实化、社会化性质，从而为寻求真理、变革思想开辟道路。为此，新一代知识分子根据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号令预见到思想文化转型的必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思想舆论的新鲜地带，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时局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列宁得以在俄国夺取政权，而且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理性的、稳定的、民主的西方是科学进步造福于人类的圣地的梦想”<sup>③</sup>。与文化学术界破除陈旧弊病的激烈态度相比，李大钊将寻求的目光投向苏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以文学与政治结合的视角，指出俄国文学依托革命理想与社会大众形成的强大合流，已经成为朝气蓬勃的文化新构，“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sup>④</sup>。这就是说，文学感染力播下的革命种子，远比单调的理论更激荡人心，能够负载历史使命引发社会转变。一言以蔽之，文学前沿寄寓着民族觉醒的希望。

其后《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极力宣告苏俄革命对于中国出路的带动作用，而在李大钊之前，还没有人能够点破黑暗中国的专制恶疾，将政治意图寄予慷慨陈说，满腔热情地写就理想彼岸的光明与生机。苏联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事实，新型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心理有了确凿的寄托，他们在实际创作中不由自主增强了借鉴的意愿，以此奋力超逾“进化”“自由”“民主”学说的五色杂陈。李大钊通过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杂文，称颂宝贵的“今”<sup>⑤</sup>，鞭策青年“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sup>⑥</sup>，

① 蔡元培：《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总序》，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德]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③ [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④ 李大钊：《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杨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⑤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3页。

⑥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99页。

与“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sup>①</sup>彼此呼应。在五四运动之前所作的《新旧思潮之激战》《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现在与将来》中，李大钊着眼于披露广大民众的深重苦难，勉励青年不要踌躇踟蹰，须从旧营垒中冲出，加紧跟上时代的发展。这种将新型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矛盾并置的革命号召，更加容易启发躁动的国人朝向历史大势齐心前行，应该看到，对于当时急迫的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将现实与未来连为一体的全新的乌托邦”<sup>②</sup>，而正是十月革命使早期惊醒的知识分子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整体视界，个体之我的求索才能够衍生出向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转化的全然需求。

“五四”时期，是大众意识越发活跃的时代，鲜明清晰的精神指引促使更多知识分子呈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过渡的性质。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提出：“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sup>③</sup>这里毛泽东由于初步接触李大钊，所强调的“平民的文学”，不仅包容人道主义“平民文学”的观点，更提出要以“平民主义”发掘平民存在，反抗“社会的”“思想的”“国际的”<sup>④</sup>强权。其意义在于宣泄反传统和反列强情绪的同时，还本着自发的政治和阶级认知，以文学的话语方式激发芸芸众生的联合。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召唤：“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sup>⑤</sup>以平民化的视角阐释时代诉求，便触及了社会问题背后的根本矛盾，其中也包含了一个政治主体思想深处的自我苏醒。瞿秋白主编的《新社会》杂志也于不久之后面世。从劳动问题到阶层冲突、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再到妇女问题，瞿秋白总是切中大众人生的痛苦所在，探究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这就超出“为人生”现代文人呼吁的“血和泪的文学”，而是要从血和泪的挣扎引发不平和抗争。据郑振铎回忆：“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sup>⑥</sup>《心的声音》作为瞿秋白面向悲惨人生引发的心灵震动及由衷慨叹，借着阶级意识尚在萌芽的方式去耳闻目睹，去揭露确凿的甚至病入膏肓的现实，女佣、小贩、弃儿、乞丐等真实形象交织闪现，委婉细腻的描画自有控诉的暗示，创作者愈发领会社会的黑暗、不公并不能长存，必须寻求人们精神面貌的突破，堪称新兴知识分子日益浸染马克思主义之际政治格局逐渐成型在场性典范。

## （二）文学行动促成新式政党的问世

“五四”时期还是价值导向多元的阶段，频繁复杂的思想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了要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sup>⑦</sup>，随着传播阵地的廓清，中国首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正式发表。李大钊于该文表明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暗含着彻底改造国人面貌的殷殷期盼，“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sup>⑧</sup>。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彻底改变腐朽制度的立场与公众意识趋于同一，对于社会人生，对于文化思想都有批判与重建的意义。对比“五四”时期“民主、科学”启蒙，改造社会与突破自身两相结合的路径，更能为深陷多重危机的中国国民提供精神导引。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也为李大钊的文学观念带来新质，在他看来，新的白话不代表新的文学，介绍新的学说也不是新文学，“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sup>⑨</sup>。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为文艺创作带来别开生

①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124页。

② 李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山西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2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页。

⑥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32页。

⑦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228页。

⑧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194页。

⑨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277页。

面的新路和新意，这种将时代认知与文学功用相结合，增进意识形态引导性的方法准则，无疑成为新文学蜕变的征兆。李大钊这一期间文采斐然的《牺牲》，深刻地体现出，将科学真理做出铺陈的先驱者逐渐增强的历史主动性和意志力，折射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于现代思潮中不断明晰化，逐步渗透文化心理的深沉内面，渐至转入与个体信念生死与共的境地。而唯有文学修辞式地向着精神深处追溯，才能于深刻的意境中，获得逐渐成熟的情感共鸣和人文思辨，以此抵抗同时代僵滞腐朽的思维和制度。

毅然决然的思想冲破激起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们文学、文化的再构行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是陈独秀继《文学革命论》的又一文艺评论，在现代文学的价值和功用层面，颠覆早期直观性、体认性的“三大主义”，要求表现时代的“最高心情”<sup>①</sup>，结合这一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和李大钊在思想认识上达成南北呼应，共同酝酿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可想而知，“最高心情”正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抽象概括。他主张以科学的话语理论推翻导致文化运动停滞不前的落后因素，进而以更为深层的、热烈的企望“创造新的政治理想”<sup>②</sup>，一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样式逐渐显露框架，该行为认知推动文学革命个体倾向的人文话语全面转向和时代交集的精神轨范，亦即“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sup>③</sup>，从而赋予新文化运动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使命任务，跃跃欲试将文学界面推向政治建构的先锋，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能够在时代困境中扬弃自身，愈益以躬身下沉的姿态寻找中国的出路。

诚然，若要使得尚未普及的政治理想在中国深入人心，定要以现实的行动去验证抽象的体认。1920年10月，青年瞿秋白带着迫切改变旧有社会的愿望，亲身向着赤旗飘扬的苏联行进。其在记录路途见闻的同时，以清新婉转的笔触思考教育、经济、生计、凋敝等问题，当辗转到达向往已久的苏联，自然之象顿时别开新境：“此中却还包孕着勃然兴起，炎然奋焰，生动的机兆，突现出春意之内力的光苗，他吐亿兆万丈的赤舌，几几乎横卷大空。”<sup>④</sup>水到渠成地将实现蜕变的心灵兴会发挥到极致，从这里，人们才深入地领会中国先知先行者们何以在不断摸索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精神，决意走上革命道路的。然而上升到历史象征的分析角度，《饿乡纪程》及其续篇《赤都心史》之所以成为时代潮头的闪光作品，则是在更高意义上传达出广泛、久远的精神参照，暗示中国命运开启重大转折：“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在瞿秋白的生花妙笔下像凸版雕刻一样，本身就成了一件精致风雅的艺术品，凝缩了历史现实与集体理想。”<sup>⑤</sup>诚如斯言，这番赴俄的考察报道称得上符合历史规律革命道路的文学性注解，也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辨识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路径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可以看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在该国成为精神旗帜的先进政党，对已经产生独立思想和敏锐判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形成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并且导致文学形象再作用于时代场域，直至发展成为明显的政治动向——1921年7月，李大钊创作的人物略传《列宁》发表，主要通过十月革命之前寻求解放的青年列宁，为中国提供一个年轻政党的样本范式。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的反抗道路清楚地显示：政治意识的原动力是如何转化成了为一个理想社会而昂扬奋进的行动力。显而易见，李大钊在这里暗示的便是建党的实践。换句话说，革命必须要有具备执行效力的共同体建构。中国的建党序章由此体现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经历了打破传统和追求现代的思想历练之后，在精神追求上达成的共识。

“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舆论基础。”<sup>⑥</sup>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了彼时客观真理阐述与传播的先声，他们一方面致力推动新文学一翼擘画现代民族国家的神圣理想，另一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编：《新青年》（第7卷·下），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②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第6页。

③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第5页。

④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⑤ 胡明：《瞿秋白的文学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9—130页。

⑥ 吴义勤：《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光明日报》2021年6月22日。

方面出于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拓展文学实际行动的作用空间——“要作社会改造的文学”<sup>①</sup>，开辟出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合流的先河。

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国人有了根本的思想依凭，不仅意味中国文化思潮在 20 世纪大断裂过程滋生除旧布新的能力，更意味着历经曲折艰辛和冲破思想局限，当今这个无产阶级政党身处飞速发展的时代，能够正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秉持历史自觉与主动意识，继续造就并完善继往开来、力挽狂澜的精神画面。《大江大河》《山海情》等文学作品提供了当下丰厚的人文支撑，在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具体表现中，通过历史抱负的贯通性述说，指向自我发展投身社会进步的实践行动，并进一步地，以文学志业的独特经验体察新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表达着喷薄的生命意志和充沛的创造力量。

## 二、革命新动向凝聚以笔为戈的锋芒

中共一大胜利举行，理所当然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革命历程就一帆风顺。如李泽厚概括的那样：“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sup>②</sup> 遵循以阶级斗争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表示将发动无产阶级，消灭全部阶级压迫。在反帝反封建的总体图式中，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不仅唤醒了广大劳苦群众固有的阶级意识，同时也汇聚各方面的力量掀起中国革命高潮，在中国共产党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延展中国新文学思潮面对风云变幻复杂斗争而做出的应时之变。

### （一）文学强化阶级声威的功效论证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面临战乱的磨难和各方挑战，由此带来两重性：一方面，严酷的环境增加了革命的艰难；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坚持文化斗争有了实践的空间。1924 年前后，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国民革命一发而不可阻挡，不少中共党员立足革命前线，进一步投身文学事业。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文学与革命》、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便是个中典型。“应该象托尔斯泰一样到民间去”<sup>③</sup>，“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sup>④</sup>，“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sup>⑤</sup>，“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sup>⑥</sup>——种种见解表明文学直接承担革命使命的话语时期来临，要求文学作品肩负实际斗争的推动作用，要求创作者们投身具体行动经受反复锤炼，为革命运动摇旗呐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舆论的阐发，从实际目的来看，不外乎是功用性的，毕竟正值全国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关键时段，因此在文学工具性还是独立性的差异上，早期中共党员坚持选择了前者，他们看重文学鼓动民众的巨大感染力，突出强调文学的刺激性、鞭策性，使文学功能与革命活动产生直截了当的联系，唤起中国无产大众迎难而上。

如果说，这些党员新生力量提出文学“武器论”是本着革命斗争的现实诉求，那么进步作家出于文人内在的基本素养，以阶级理论为思想源泉，探求文艺趋势的行文线索也是不容忽视的。以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为例，这些思想前沿的作家、诗人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对新文学的思索由“五四”时期自上而下的启蒙，过渡为更具阶级色彩的文学家与革命家、革命与文学诸种关系的推进，不单要求作家真正走向革命来拓展新文学创作的能动性，而且要以阶级立场来革新文学观念，相应而生的理论空间与价值空间也逐渐活跃。值得提及的是，党内作家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面向中国社会大众，初步呈现无产阶级艺术体系的大体框架。

① 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上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41 页。

②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第 16 页。

③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1 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392 页。

④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1 卷），第 396 页。

⑤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1 卷），第 398 页。

⑥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1 卷），第 407 页。

尤为关键的论调是，无产阶级艺术除了描写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还应该追求主观内心的合理映现，强调无产阶级精神品质“是从认识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而生长的，是受了艰苦的现实的压迫而迸发的，不是为了一时刺激与鼓动”<sup>①</sup>，那么在艺术表现上就要避免一味使用“粗酷的象征，以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气焰”<sup>②</sup>。有别于单纯地将文学视作精神利器，或者只不过是初步感知阶级理论，此论注重艺术与政治的微妙平衡，文学既是思想感情的酝酿处所，也是阶级意识的表现媒介，贯穿其中的则是培养无产阶级理想信念的准则。因而这般将自我意识与阶级使命维系在一起的文学见地，扬弃了浅显、直接的鼓舞与煽动，能够更恰当地启发文学创作感化国人思想，发挥实际的话语动员。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开拓影响之下，新文学不断接近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寄望以文学的阶级性来重塑国民的精神性，促使全国广大民众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自觉和时代交锋的创作使命。

同一时期，瞿秋白、鲁迅等文坛名家表达了对革命的跟进及对正义的支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sup>③</sup>，“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sup>④</sup>。斗争形势的日趋激烈以及五卅高潮的蓬勃兴起在以文为引的铿锵声中得到体现，于精神契合之间，化作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丰厚养料。面对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创刊号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sup>⑤</sup>一语中的的文评分明显，中国共产党先驱者的心路历程是一个明显提升的过程，“五四”时期吹起的民意疾风蔓延至此已变得浩浩荡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决心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到底。而正是言论浸润实践，导向性与战斗性融合的逻辑空间才引出具有一定高度的思想觉悟，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落点于中国内外交困的实际问题，并且一步步推行开来，筑起中国共产党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基石。

## （二）革命斗志之于创作的自主提升

时代洪流的鲜明导向深深触动作家群体的内生动力，越发激起诗情壮志的兴发，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形势中，竟至爆发出振聋发聩的效果！沈雁冰《五月三十日的下午》、郑振铎《街血洗去后》、田汉《黄浦怒涛曲》、朱自清《血歌——为五卅惨剧作》、蒋光慈《血花的爆裂》即时反映了1925年“五卅”运动的瞬间细节——破碎的玻璃片、狂暴的枪弹、漫天的血泪、血迹斑斑的南京路、惊涛怒号的黄浦江、响彻云霄的喊杀，多重意象在表达哀恸情境的同时，也象征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面对来势汹汹的镇压，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反动势力展开凌厉斗争，挥笔疾书间，造就匕首投枪一般极具冲击性、战斗力的抒情表意与励志诗意。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抒情诗与社会》一文中指出，高妙的抒情诗来自心底真正的声音，但仅仅有主观的抒情还不足，创作激情是社会现象的内部转化，主体带着对外部的热情回应，赋形的语言方能自然涌到笔下。“只有在与外界张力发生关联时，艺术中的张力才有意义”<sup>⑥</sup>。很大程度上，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中，正是这些直抒胸臆的诗歌杂文，在和现实共振、碰撞的界面，延伸出文学形态嵌入时代命运的作用力，成为呼吁中国人民英勇抗争的历史强音。

五卅运动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反帝反封建号令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洞察敏锐的前卫作家将民众的愤怒和需求疾呼出来，正如蒋光慈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提出：“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sup>⑦</sup>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过渡的历程，新锐作家正是趁着浓烈的时代情绪，精神上开始艰难的跋涉，不断接近他们的文学目标。《少年漂泊者》是蒋光慈初期的作品，

①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95页。

②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199页。

③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⑥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⑦ 蒋光慈：《蒋光慈全集》（第6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也是革命文学萌芽时期的代表作品。出身寒微的主人公以自己流浪、成长和慷慨赴死的经历展示了献身革命的心理体验。从表征来看,《少年漂泊者》与疾风骤雨的革命话语极为贴近,但细细体会,真正不落窠臼的是在蒋光慈笔端,遭受压迫的人性并不是在盲目挣扎,而是遵从了社会期盼及其狂暴声势而扩展的普遍化倾向。这表明知识青年在不满现实的抗争中,打破了“五四”以来的惯性思维,自我革新的意识不断深化,他们意识到想要追寻个体的自由,就必须投入到群体的斗争。这样的作品,蕴含的就不仅仅是国民革命的时代情绪,而是成为现代革命谋求解放的新生之光。五卅运动开启中国共产党初期蓬勃的局面,然而因为不同党派政治问题的集中爆发,革命骤然突变。洪灵菲的《流亡》,便是记载革命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反革命血腥屠杀之下一路漂泊的真实底本。主人公沈之菲在不同城市流落颠簸,亲眼见证排山倒海的通缉,不可触摸的殉难,间或穿插革命与爱情碰撞的情感热力,知识分子感伤脆弱的矛盾心绪一步步趋于阶级倾向的渐进式明朗。在《流亡》结尾,沈之菲继续踏上推翻恶势力的革命征途,寓指经过国民革命夭折,痛苦寻找出路的青年有了可循的轨迹,他们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非机械的、形式的,恰是本着与过去决裂的决心作出的选择。在此过程中,革命青年身上的苦闷、感伤的涣散思想就充分被过滤了。事实上,这部作品与蒋光慈的《野祭》一并可以看作大革命知识分子心灵重生的真实材料,“因为这些曾受五四人文精神洗礼而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他们用虔诚的政治信仰和青春的蓬勃朝气,在彻底背叛五四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向社会昭示着他们对于前人的大胆超越”<sup>①</sup>。于是,表现革命精神的文学创作便超越了普通文学观念,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和政治指向,《野祭》中的淑君在经历个人爱情创伤之后,热衷劳苦大众运动的劳绩和不怕牺牲的蜕变,不由使人信服——与合乎时代发展的科学世界观结合到一起才不会使革命口号失之于虚飘。较之早期《少年漂泊者》的亢奋与热望,更能体现真真切切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凛然与庄严,也包含个体知识分子经历革命血和火的考验后,开始意识到义不容辞扛起社会整体责任的锐利精神力度。

关乎那个时期知识青年的阶级倾向,瞿秋白之后有明确界定:“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智识阶层,终于发见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sup>②</sup>革命风潮的转折时代,个体生命也经历着不同寻常的转折,逐步觉悟的青年走向了与“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志同道合的革命道路,时代的呼声便从统战的国家革命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客观地说,革命文学家的创作中,革命运动重大事件只是社会动荡特殊时期的一个模糊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聚拢,形成的献身精神才是开风气之先,前所未有的斗争意志以及对于生命理想的触发和强化,成为那个时代极为生动的画面。如同鲁迅《复仇》里战斗者们的刚正勇毅与日逐增一样,顾仲起1927年创作的《镜子》具有了认识的彻底性和行动的坚决性。小说别开生面之处在于,女主人公镜子并不是以自身弥漫着矛盾困惑的面相出现,而是频频借助隐含作者的第一人称来展现资产阶级女性的递进式心路。最终,她人生的突出锋芒正是与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决裂,全部身心投入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比起这一时期发表的《幻灭》借用爱情的含混来呈现国民革命的波谲云诡,《镜子》之中的纯粹感情或许更为光洁地呈现了一方信仰的净土。值得注意的是,《幻灭》尽管时刻散发着焦虑和沦落的普遍心理,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危急形势中涌动的灵魂哀鸣还是隐约表达了反动势力必将灭亡的倾向。借曲笔渲染志向还可见于叶圣陶的《夜》、黎锦明的《尘影》,共产党员被反革命力量杀害后,他们的下一代稚气未脱,还是生气勃勃的样子,寄予着未来向何处去的希冀,“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sup>③</sup>。尽管在革命的特殊时期,革命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规律性受到削弱,然而隐伏着的勇气与希望却是时代作家所注目而向上生长着的

① 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

世界。如此一来，走在时代前列的文学向度便由“五四”时期的个性化，到国民革命的群体化，直至中国共产党对于阶级区分逐渐清晰，暴发出视死如归气概的崇高化。纵然大革命瓦解，共产党员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人数锐减，然而前瞻性、超越性理想信念激起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激发无数仁人志士在血与火中传递着不屈的斗志和高尚的节操。这是时代沉淀于文学创作悲壮深沉的精神史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宝贵的特色。

革命高涨推动文论连同作品的实践，自然也存在诸多不足，如观念先行、流于同质化、总是置于阶级矛盾的对立冲突来呈现人物品质等，但是也取得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最初的精神内涵。作为革命精神具体化身的新文学一域，其中情境的激荡和热情的倾注，也使有限生命投入无限奋斗的浩然之气得以延续。

对当前文学的创作者而言，置身日新月异的文化转型期，尤其应当将战争时期的激扬意志渗透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步伐。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经历口号化、程式化、碎片化的革命小说发展脉络，新时代小说家在对时代英雄再现和塑造的文学脉络中，叠加起更为宏阔的视角和开放的气势，坚韧的灵魂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当下的温度。长篇小说《纪念碑》营造出革命记忆与改革开放的互文对应，扶贫小说《战国红》将革命前辈的理想信念和攻坚克难的扶贫进程血脉相连，报告文学《新时代红旗谱》使得红色基因跨越历史时空落点在了新时代楷模群像，他们奋斗的背后有着赤诚精神的传承，也有着对于丰盈心灵的感念与回应。面对筚路蓝缕的社会变革，血气基因的对话与书写空间接续反映了党在前行历程和民族复兴进程中顽强求索的生命力，推进了从历史的景深处见证中国共产党赢得一场又一场战役的莫大可行性。

### 三、为民新使命掀动工农觉醒的波澜

中国共产党建成后，引导组织的工人运动继之而起，尽管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镇压迫害，但革命沉浮应运转化成文化运动的自觉识见，即如“以文学辅助政治革命的实用功利目的，来消除文学创作的自由化倾向；以文学的集体主义价值追求，来挽救个性化文学创作的现实困境；以对工农革命巨大力量的艺术再现，去取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痛苦彷徨”<sup>①</sup>。国民革命的潮流引发全国性的广阔斗争，从文学精英的行动“到民间去”来看，由“五四”高坛沉入现实动荡的知识分子唯有接触底层工农大众，表现并普及被压迫阶级在革命进程的实际作用，才能整合更踊跃、更强劲、广泛性的社会主要力量，推动启蒙话语向革命话语转化，再往阶级话语的纵深迈进，行之有效地纾解不间断的现实逆境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漩涡。

#### （一）劳工奋起反抗的激越书写

“五四”文坛虽然出现描写平民苦难的小说，但是阶级立场还不鲜明，并未分明地表现应该联络的力量有哪些，应该推翻的势力有哪些。实际上，早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就指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sup>②</sup>，在党组织的教育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和黑暗的社会短兵相接了。新文学的表现对象也随之有了一个质的突破，工农抗争的实际情形在文学领域一波接一波地被陈述。李大钊《黄庞流血记序》、周恩来《生别死离》记下了中国工人运动触目惊心的画面。李求实之《二七纪念歌》、邓中夏的《血和铁》堪称党成立后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泪悲壮史诗，残酷滴血的现实使得作品火速流传开去，构成文学实践与革命态势的联动效应。劳工大众日趋联合起来抗争，主体意识也在鲜血和生命的浸染中磨砺成长——瞿秋白的《洩漫的狱中日记》用日记体的方式，假托罢工工人被捕入狱后的流动意识，将军阀残杀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的史实记载下来。触目惊心的画面夹杂着吐露自我的心声，直透人心之处正是工人主体有意无意的沉吟及思索，与严酷处境的对抗、潜隐的义愤为不断掀起工人运动高潮奠定了心理基础，而面向工农及其诤友的立场对于新文学使命的开

<sup>①</sup> 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第196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页。



拓也显而易见。

应该说，中国工人在历史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发生，充分显示出工人自身强烈的历史担当。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反抗压迫，已不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指引，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诉求，是到了重新阐释文学启蒙与解放命题的时候了——“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sup>①</sup>。这启示此时加强与工人联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文学要真正成为时代前进的火与光，在做到“到民间去”<sup>②</sup>体验生存血泪的同时，还得履行更加深层的任务，那就是以积极的姿态与群众为伍，参与阶级力量的觉醒与重构。以作于1927年的中篇小说《一条鞭痕》为例，创作者钱杏邨痛感革命波折中智识阶层与广大民众脱节的问题，迫切希望作品中“不顾一切为劳动阶级去牺牲的莎菲”能多起来，褒扬故事主人公最终从知识青年的心理束缚中跳出，走上一条光明却不乏艰苦的道路，从而真正与劳工阶级为伍，去做民间主体力量的改造者与重塑者。与此相关的是，卢卡奇曾提出著名结论：“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sup>③</sup>他强调意识形态融入心理建设之后，无产阶级向理想目标进取的自主性，实际上铺垫了工人群众思想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契合之处。如此一来，中国劳工反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渐趋集中，正反映了无产阶级从能动认知走向真正实践的过程，他们由追求独力战斗转入向心力大的组织，而群众基础的扩大、互渗也为中国共产党带来富有强度的文化空间。

蒋光慈的《短裤党》无疑让人看到国民革命工人运动的最高峰，这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实时创作，最为光彩凌厉的价值便是共产党人和工人组织紧密配合，爆发出胜利告捷的巨大能量。通篇从一个个影射人物原型的身影呈现出共产党员的导向性作用，昂扬着挫败中重生的乐观自信。而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在于，作家花了一定篇幅表现工人主体的个性瑕疵及其正向转变，如底层工人鲁正平的斗争意识、作派由躁急盲动向沉毅勇敢转变，展现出工人阶级接受无产阶级意识之后的清醒抗争，这般了解群众、记录时代的共情性与及时性，在新文学的创作空间显示了多重的意蕴。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回顾上海工人起义的风潮之作，作品以备受盘剥和浴血搏杀为基本底色，契合了郭沫若呼吁文艺创作“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sup>④</sup>的号召。小说中牺牲者断掉的手臂竟然幻化为战斗中力量强硬的铁拳，让罪恶者在暴力中灭亡，由激烈场景寄予的“浪漫蒂克”理想，可以辨识出广大劳工经受共产党意志的洗礼，找到虔诚的信仰来恢弘其灰暗的生命。在其中，工人本身作为社会和历史主体的价值感横逸而出，与作家想象力在历史现场共同释放，传递的不仅仅是阶级成长的紧张与冲突，更是在力透纸背的苦斗中所开启的精神能量。在这一动力面前，文学期待以高扬的方式融入现实运动，阶级反抗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斗争旋流中发挥出真切的作用。

## （二）农民走向新生的路径摸索

在城市暴动险象迭生的客观形势下，1927年3月出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关注农村农民结出的硕果，迅速而集中地将几万万农民的强处和声势显现出来。对照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涌动的平民道义，这份报告立于无产阶级的位置，承担起改变农民命运的历史使命，并且直抵农村真实情况，充满了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务实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积压已久的怒火就要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声势浩大地爆发。

事实上此两年间，陈独秀、瞿秋白也陆续发文探讨各地滋生的散乱暴动。据此，李大钊于1926年8月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郑重提议：知识分子作为引导力量，不妨将进步思想转化为发动旧式农

①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219页。

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卷），第392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4页。

④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卷），第446页。

民，组织保守农民，壮大农民阶级的优势，“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sup>①</sup>。从中可以发现这些变化——从“五四”时期正式迈进现代性大门，思想启蒙者适时地探索中国农民的长期问题，然而单方面的愿望是改造不了滞重精神的，伴随水深火热的挣扎怒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采用最易沟通的方式，帮助农民塑造堂堂正正的精神。澎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叙写澎湃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实地走访，起初无法和农民深入交谈，后来找准问题切入点，用群众认同的腔调和方式，走进农民心坎的过程。更为可贵的是，从《田仔骂田公》（澎湃）、《翻身谣》（方志敏）等通俗歌谣可以看出，通过文艺手段使农民觉悟的亲民意识，构成党的先辈发动农民积极性的出发点。如本雅明所说：“当他一边沉浸于劳动的节奏、一边听故事时，重复故事的才具便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他的禀赋。”<sup>②</sup>这不止表明中国共产党文艺开垦的超前敏锐，还可以确定的是：对共产党人而言，必须认真下沉到农民生活中，方能使原本分散的沉默个体产生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激起农民的进步性。正是清醒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这样的文艺端倪对于乡土生命起到切合时宜的激励效果，前言文学家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在目下要求最切的，便是属于这一种的农民文艺”<sup>③</sup>。事实证明，对于农民觉悟足够接地气的启蒙，有效撒播了乡间武装的点点星火，推动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渐成燎原之势。于是，如何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历史的同时，也改造着历史的主力军，且又反映农民新生力量的成长景况，亟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新颖主题。

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农民反抗的兴起，还只是漫长农村武装斗争的一个序曲。由于反动力量异常顽固和国民革命整体局势的反转，农民运动陡然遭到重创。黎锦明的《尘影》即是以海丰农民运动为题材，在国民党发动武装政变当年写成的中篇小说。一心带领农民革命的共产党人熊履堂惨遭屠杀，警示了农民运动的厄运表面上来自外在的侵害，如乡绅、右派、军阀、地主等，然而从根本来说，工农运动领导者的认识和行动受到时代处境限制，特别是没有采取最坚决最强硬的阶级立场与敌对势力斗争才是导致农民运动急转直下的重要缘由。这些直面现实的文字不只是体现了新式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洞察力，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短暂苦难中的行进向度。伴随着对于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体认，毛泽东做出非同寻常的创新，红色的精神绵延到井冈山地区，未来中国革命的理路走势就此基本明晰。

客观而言，在1927年前，反映党领导下早期农民抗争的文学作品较少，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及壮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在文学作品中延续出强有力的律动——阳翰笙《暗夜》、洪灵菲《大海》、戴平万《陆阿六》《村中的早晨》、丁玲《田家冲》《水》、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等相继问世，可见处于大革命后几年间的历史场景，作家普遍认识到乡村底层一经组织之后庞大的力量，尝试为热烈进取的浪漫主义开启广阔现实的大门。尤为突出的是，通过指明变革社会的坚实力量，为新文学现代性的延展找到中国本土的丰厚根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精神再生，融入农民革命主力军的迫切意愿。革命题材乡土文学的涌现，可以说开辟了全新的场域，透视出先进意识形态与传统乡土伦理之间的碰撞，并且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确立了通过文学创作实践介入乡土社会变革的主动精神。

如今的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三农”的转型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中国在梁庄》《带灯》等作品传递着多元话语的震颤。然而更重要的，在当前宏大的乡村振兴视域中，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如众水入海一般，映现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魄力。《因为信仰》《羌山追梦记》《下庄村的道路》等作品在体现极为真切的心灵变动的同时，以扎根乡村、匍匐大地的行动，为构建新时代史诗注入动力，将创作导向提升至全体人民共享好日子、共享现代文明这一纯粹的信念。而这，才是“五四”以来文学实践从不同层级的话语系统中整体地、历史地迈向现代化的真正意涵。

①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569页。

② [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增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87页。

③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85页。

共产党人领导工农运动的直勇拓荒，促成高度集中的武装和文化战线，尽管起初的作品在艺术纹理上较为粗砺，人物形象趋于概念化、脸谱化，但革命作家初步搭建了中国新文学与底层群体的互动可能，并且按照明确的阶级立场，代表他们发出强硬甚至是尖锐的声音，在战时急流的冲击中开出一条通达宽阔的使命轨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sup>①</sup>。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学创作者大多在指定的意识框架内领会这一具有丰厚意蕴的理念，然而体民众之深、察民众之切的要求却有着延续不断的空间，成为一代代作家的艺术源泉，并且经由关注工农大众的生存事实逐步转入摹写人民意志的丰富样貌。

乃至到了当今，中国人民的生存创造和精神图景被表述为辩证性的视野：“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sup>②</sup>对于新时代文学来说，人民内涵的彰显不仅仅整合于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洪流，还要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向现实敞开，用笔触描摹中国人民心灵境遇的真切感受，正视平凡人物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奋斗当中跌宕起伏的兴与寄、情与志、感与喟，刻画出激荡时代中有血有肉的生命，展现其集主导性价值又贯穿着个体性话语的人民性特质，形成回荡百年的人文情怀，构建一个个具体人物与中国式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且真实可亲的人民形象。

#### 四、结 语

透过文学层面聚焦建党精神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化的转变与建党精神的初显是一个融合共生的过程，这个过程致力寻觅启人心智的世界观来重组现实，充满了挣扎和活力。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新文化领域进步观念的灵感火花，正是由建党精神凭恃的思想资源引发，并且通过文学语境察觉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模式是可以脚踏实地坚持下去的构想。归结起来，建党精神理性化地实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精神革故鼎新、自强不息、民本思想的组合重塑，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面附上鲜明的时代标志，融入民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时代洪流的同时，也日渐生动地演化成为文学话语的显要元素。

这般在政治、历史框架中建构的文学思维使研究者意识到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见解，人们所能触及的历史是被注解或者组织过的历史，亦即历史是一种文本，所以文学作品的价值指向在于从语言、结构抑或意义找到与政治形势、历史情态相互对照的焦点。一定意义上，只有运用社会历史文化的最新洞见，建构合乎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指向，为新时代文学再造历史意义的路径，才能重新确立主流思想文学创作的价值。这也照应了“元历史”观点的根本目的“为历史进程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总方向”<sup>③</sup>。把握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构历史，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体认它。进一步说，文学与历史互为镜像彼此赋予，并不只通过修辞、叙事展现，更应该立足观念、理念层面进行综合研究。为此，以建党精神为逻辑起点，建构一套回顾过去、重返当下的精神源流谱系便具有了贯通性和积极性的价值，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也可以由持续性的基本理念联结起来，从而凸显文学史深藏的精神跋涉和思想推进。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建立一种纯然不杂的，抛却其他任何感知体验的意识形态预设面具。当扶贫文学以贴近当下乡村的现实来描画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当革命历史的经典叙事呈现求新求变的探索，当战疫文学向民生现实传递共克时艰的正能量时，时下的作家已经为介入历史和现实留下各种各样具体而微的见证，展示中国人民实际作为的背后，对普通人精神状态的挖掘是既深且广的，也为人们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多重思考。

归根究底，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个体的全面发展是以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为先决的，这不仅意味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861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③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8页。

着中国当代写作在秉持初心、启迪心智的诉求上努力寻找普通个体的情感温度，关键还在于新形势下文学史观的整体指向和对现实活动的充分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性感性、琐碎的“抽象化”。由此，凝聚着使命感、实践性、生命力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建党精神位于当下中国社会实际的有力彰显。正因为有着清晰脉络可循的百年党史本源根基，中国故事才迸发源源不断的内动力，用践行初心使命、直面各种挑战的精神，与世道人心建立有益互动，使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构成不断优化，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 Literary Trace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WANG Hui-hui&ZHAGN Tang-hu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1917 to 1927 was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 was also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st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The progressive literati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s the main force described the important events with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d show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urbulent reality and social trends. The magnificent history and spiritual gist of the planning, found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CPC emerged in literary elucid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spiritual pattern of the CPC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it is not only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enter the literary space, but also a re-cogni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hich is enough to highlight the basic significance of the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in the long-term struggle of the CPC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inning Period,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Literary Trace

[ 责任编辑：廖 霞 ]